

关于历史 评价问题

嵇文甫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关于历史评价问题

嵇文甫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关于历史评价问题

嵇文甫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印张 38,000字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1,000

书号11002·511 定价0.15元

本书一九五六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
重印,增加了《珍视祖国的思想遗产》一文。

目 录

关于历史评价问题	1
小 引	1
一 人民性与进步性——历史评价的基本尺度	3
(1)站在广大人民方面说话	3
(2)推动历史前进呢,还是作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7
(3)阶级立场与历史主义	12
二 历史评价中的矛盾性与具体性	15
(1)历史充满了矛盾	15
(2)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19
(3)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	23
三 历史评价中的现实政治意义	29
(1)讲历史不要忘了当前政治任务	29
(2)反客观主义	30
(3)也不是主观主义	32
四 历史评价中常牵涉到的几个理论问题	34
(1)动机与结果	34
(2)个人与群众	38
(3)偶然与必然	42
(4)成功与失败	47
珍视祖国的思想遗产	51

关于历史评价问题

小 引

这本小册子是就几年来我所做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的几篇报告整理补充而改写成的。当做这些报告的时候，本来只是想帮助历史教师们解决一些教学上的疑难问题；可是在这次改写过程中，正碰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高潮，这就使一些论点格外明确，而更具有战斗的意义。

教历史不单是讲故事，它要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拿活生生的经验教训，给人们指出应走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思想斗争。可也正因为这里面具有战斗性、阶级性，所以就连反动统治者也向来都把修史当作一件大事，紧紧抓住历史这武器，“寓褒贬，别善恶”，选定典型，树立旗帜，企图把人民引入自己给他们所规定的道路。为着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真相。中国历史中的一些糊涂账，把人们搞得眼花缭乱，就是历来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那班御用学者搅闹出来的。

例子不用远举，眼前就有胡适这个大骗子，专门给万恶的腐朽透顶的反动统治阶级效劳，最恶毒最无耻地极尽歪曲历

史的能事。他在中国思想界搅闹了几十年，恰巧又特别垂青历史这门学问，自称有“历史癖”，于是乎中国历史就大倒其霉，任凭他信口雌黄，“翻手为云覆手雨”，把几千年来的功罪、善恶、是非、邪正，搅乱得一塌糊涂。这样，在历史评价问题上，胡适就成为我们首先要对付的一个险恶敌人。

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把历史夺回到人民手中。对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都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照下予以重新估价。对于一切反人民的谬论，特别象胡适之流的胡说八道，我们必须扫荡廓清，决不容许它们再混淆是非，迷惑青年。

当然，要扫除各种反动历史观点，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尺度来衡量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多历史教师感到历史评价的困难，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是有人说：“这很好办。既然是时代变了，历史评价的标准也变了，那末，来它个大翻案，凡是从前认为好的都说成坏，从前认为坏的都说成好，不就得了么？”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其实有些人，象秦桧，从前说他坏，现在仍然只能说他坏，决不会就说他好；象岳飞，从前说他好，现在尽管说法有些改变，但仍然是说他好，也决不能就说他坏。还有象汉武帝，唐太宗……这一类人，从来评价就很复杂，这案又怎样翻法？显然，这种无原则的简单的翻案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又有人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个封建社会。譬如生在一个大污泥坑中，谁也免不得沾上一些泥污。岳飞也罢，秦桧也罢，反正都是封建人物。不管什么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还不都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甚至象黄巢、

李自成,那些农民革命领袖,也免不了要当皇帝。唉,一丘之貉!”这样,对于历史人物来一个全盘否定,也就用不着再作什么评价。这样,也就全盘否定了历史,也就根本不用讲历史了。

和这样看法相反,又有人来了个全盘肯定的看法:“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就封建说封建,当其时只能是那个样子。就连秦桧,也自有秦桧的道理呀。”这样,讲历史只是专门替古人——不管是怎样的古人——作辩护士,还那里说得上“评价”?

以上两种看法,各执一偏,尽管彼此相反,可是同样都把历史评价搅混了,或者简直可以说都是根本取消了历史评价。对于历史人物不能漫而言之,笼统一大包都宽容,或者笼统一大包都骂倒。我们对于现实人物——连地主和反动派在内——都要按其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对于历史人物又何尝不是这样。“好”是怎样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坏”是怎样的“坏”?“坏”到什么程度?这里面都要有一定的分寸。象那样笼统一大包的办法,比起简单的翻案法也实在并不高明多少。

那末,怎么办呢?历史评价究竟有没有可靠的标准呢?当然有的。下面就要谈谈这个问题。

一 人民性与进步性——历史 评价的基本尺度

(1)站在广大人民方面说话

我们的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是人民的历史。人

民是历史的主体，一切历史评价都得看符合人民利益与否为标准。凡是属于人民方面，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所欢迎的，都应该予以好的评价，而对于一切反人民的都予以坏的评价。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我们看，象黄巢，李自成这班人物，在旧日反动的历史书上不都是把他们当作贼寇，尽量加以诬蔑么？可是现在都被尊为农民革命领袖。因为他们确都是从人民中来，代表人民利益，和广大人民一道，向反动统治者作斗争，的确都是人民所欢迎的英雄人物。象这一类千百年来为多少御用学者所诬构而成的最不公平的历史冤案，当我们人民的时代，自然是一定要把它翻过来；乃至所有向来埋没在社会下层，被反动统治者踩在脚下的，现在也都抬起头来，得见天日；而一切独夫民贼，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掠夺人民、欺骗人民的人，却都要在人民的历史裁判前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我们要来个历史大翻身。

但是，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者，不能单凭阶级出身来作历史评价。如武训，纵然是个乞丐，是从社会下层被压迫人民中出身，我们却只能说他是个封建奴才。因为他替他的封建主子作欺骗人民的勾当，早从人民的队伍中背叛出去了。至于对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我们也不能一笔抹杀。在他们中间，有的是除了毒害人民以外，再没有别的事情，有的却也能对人民有一定的贡献。事实上，由于人民力量的强大，稍为聪明一点的统治阶级人物，也常常要考虑一下人心的向背，做出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以收揽人心。人民因此也就拥护他。不管由于什么动机罢，只要他对人民有一些好处，人民决不埋没他。人民的眼睛从来是雪亮的。

在过去统治阶级的人物中，也有所谓“功德在民”的。《礼记》上讲：“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就是说：有创作发明为大家所遵行使用的，献身于某种事业的，对安定国家有劳绩的，能防止水旱等自然灾害的，能抵抗侵略外患的，都要被纪念，被歌颂。这就是所谓“崇德报功”。自然，过去统治者所谓“功德”，自有他们一定的具体内容，我们姑且不管。现在照我们自己的看法，如蒙恬造笔，蔡伦造纸，都可以说是“法施于民”，值得我们纪念。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就抹杀他们在创作发明上的功绩。他们所发明或改进的笔和纸，不仅可以供当时统治者使用，直到现在，我们不是也还在使用么？又如“以死勤事”，勤的什么“事”呢？有些“事”固然是专为着统治阶级，但有些“事”也不尽然。正如晏平仲所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过去许多所谓“忠臣义士”，自然有些只是为君主个人而牺牲，那只能算君主的私人（私昵），不干人民的事；有些却有更大的意义，既不限于君主个人，也不限于一家一姓的“社稷”，如文天祥、史可法，他们的牺牲，关系着全民族，自然是应该受到人民崇拜的。

根据以上所说的精神推论下去，历史上许多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就当时说，他们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可是直到现在，象《孙子兵法》这类书，不是还给我们种种启发，成为我们军事学的宝贵遗产么？我们打开《左传》、《通鉴》等书来看，历代名将在军事学上都有很多贡献。政治上象管仲、子产、诸葛亮以及其他许多所谓明君、贤相、清官，也的确有些好办法，

因而“遗爱在民”。又如历代的学者、文人，象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黄宗羲、王夫之等，自然也不能说他们和统治阶级没有关系，可是又谁能否认他们对于人民的伟大贡献呢？历史上许多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只要对人民有贡献，都是应该表扬的。至于许多从历史上传下来对人民很有用的东西，那都是历代人民的劳动所创造的公共财富，我们也不应该抛弃，硬划归统治阶级的名下。

当然，首先还是要明确立场，划清界限，不能把对人民多少有一点贡献的统治阶级人物，随便都称作人民文学家、人民艺术家、人民教育家……。本来，在封建主和奴隶主所统治的社会中，所有政治、经济、学术、文化都为他们所独占；真正属于人民方面的，都被打在地下，我们很难见到。如果能从千百年沉埋中发掘出一点真正属于人民的东西，纵使它还仅仅处在不成熟的萌芽状态，我们也将看成至宝。但是可惜这些东西总是很少见的。拿先秦思想家来说，尽管有许多杰出人物，从他们揭发暴露当时统治阶级的罪恶方面来说，往往带有人民性，甚至很强烈的人民性；可是一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就又从人民方面溜开了。例如孟子，痛骂“独夫”、“民贼”，大声替人民呼吁，可以说具有极强烈的人民性；可是一拿出他自己的正面主张和根本见解来，却又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那一套贵族统治思想。他的道貌岸然的正统气味，把他的人民性竟掩蔽起来了。因此，我们对于孟子，虽然指出他的人民性加以表扬，却终不能把他一直放到人民的阵营里，轻易送给他一个人民思想家的称号。这个界限是不容混淆的。又如庄子，也具有强烈的

人民性。“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句话把当时统治者的丑恶诈伪，揭露得多么痛快淋漓！但是一说到究竟，却又逃避现实，完全遁入虚无主义的幻想，正反映着一种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毒素是不容许混入人民阵营的。

总之，我们作历史评价也必须“一面倒”，坚决站在人民立场上。人民利益就是历史评价最基本的尺度。毛主席教我们“眼睛向下”。不仅干革命，做实际工作，需要这样，就是研究历史，做历史评价，也都得这样。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艺，毛主席却因其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大大加以发扬。久被歧视，不齿于科学之林的中医，毛主席却因其集中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经验智慧，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曾有过长期的贡献，并且现在也还联系着中国人民，起很大作用，所以特别提出来教大家予以重视。如大家所熟知，他一把抓住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深知农民革命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这些地方，除非常“眼睛向下”，看到社会底层里，和中国人民的思想交流在一起，是领会不出来的。（说到这里，又想起胡适。他看不起祖国文化遗产，把农民起义看成流寇，正是他一贯看不起人民，一贯反人民的具体表现，和这里所讲恰成一个对照。）在这个历史评价中的人民性问题上，我们也必须向毛主席好好学习。

（2）推动历史前进呢，还是作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怎么叫做好？怎么叫做坏？合乎历史发展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就叫做好；违反历史发展规

律，阻碍历史前进的，就叫做坏。历史是广大人民的历史，推动历史前进就是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广大人民也正是历史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根本说来，中国历史的进步，是由于广大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中国历史的停滞，则由于历代奴隶主、封建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此，表扬人民的创造发明、革命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揭露反动统治阶级阻碍历史进步的罪恶，就成为历史评价最主要的任务。

但是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也不能说在历史发展上没有起过一些进步作用。如秦始皇虽然是个专制暴君，但是他结束了古代封建领主割据纷争的局面，创立了一个空前的统一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截然划出一条界线，这种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无论如何是不能抹杀的。又如汉武帝，唐太宗，开疆拓土，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贡献。中国所以能成为象现在这样广土众民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和这些大皇帝的活动分不开的。如果说在俄国历史上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末，在中国历史上，象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应该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事业都是有伟大进步意义的。不过这里得说明一点。这些皇帝所以能推动历史的车轮，有那样伟大的成就，仍是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如秦的统一，汉唐的开疆拓土，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合乎群众的要求。假如不合大势，不得人心，而随意乱动，其结果总遭失败，如隋炀帝征高丽，唐明皇征云南，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即如汉武帝征大宛，唐太宗征高丽，由于不合大势，不得人心，也还是吃了些亏。以此类推，伟大工程

的兴建，科学技术的发明，许多英雄人物在历史上发挥的进步作用，其背后都有广大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作依靠。离开人民，什么帝王将相，英雄伟人，都做不成事业的。

再说，所谓进步性乃是就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而言，只是从当时看，而不是从现在看。如果拿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古人，当然都不够格，都是落后的，还有什么进步性可讲呢？如后汉张仲景，是个大医学家，他所著《伤寒论》多年来当作济世活人的书，在中国医学史上有极大贡献。如果一定要指摘他那里面充满了阴阳五行，乌烟瘴气不科学的东西，责备他道：“为什么不根据解剖学呢？”这就未免开玩笑。请问当汉朝时候那里去找解剖学呀！又如黄巢、李自成，不成问题，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农民革命的英雄人物。但是，正如斯大林论拉辛和布加乔夫那班俄国农民起义领袖的话：“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假如他们不腐化享乐，不犯错误，一直前进，圆满成功，也不过当一个“好皇帝”，解除一些农民的痛苦。横竖决不会组织个苏维埃。在近代无产阶级没有出现以前，农民革命总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也不必因为他们当了皇帝就骂他们反动。其实在当时能作个“好皇帝”也就不算坏了。比如朱元璋，我们现在骂他“掠夺农民革命果实”，当然也是应该的。但这是提高到现在所认识的原则上讲，也倒不一定单纯地只因为当皇帝就骂他——朱元璋后来离开农民，变成封建主了。但是他在当皇帝以后，究竟也作了一些解除元朝苛政，与民休息的事，还是满足了一些农民的要求。通过农民革命而产生出来的新王朝，象汉高帝、明太祖那样的政权，虽然并不是农民政权，但是由于他们采取一

系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总多少缓和了阶级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使中国历史还可以往前走。这便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

《庄子·天地篇》上有这么一个故事：子贡出游，过汉阴，见一个老农种菜园，“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一罐子一罐子的浇地，用力很多，而成绩很小。子贡就告诉他：“有一种器械，一天能浇一百畦，又省力又有功效，你不愿意用吗？”老农仰而视之，说：“咋着？”子贡告诉他说：“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沝汤，其名为槲”。子贡把槲的巧妙形容得了不起。但是老农听罢以后，忿然作色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这就是告诉子贡，槲槲太机巧了，用了以后人心就变坏了。所以最后他说：“你这个法子我不是不知道，我不过羞而不为！”要让我们现在想，槲槲有什么稀奇？落后的很！但是在战国时代，却把它看成那样机巧的东西。我们嫌它太落后了，战国的老农，却还嫌它太进步了！（自然，庄子这段寓言是一种开倒车想法，不见得当时人都这样想。但“槲”在当时毕竟是一种新工具，所以为守旧分子所不喜。试看唐诗里面，就说：“寂寞于陵子，槲槲方灌园。”显然把槲槲当成一种古老东西看待。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历史上许多事情正是这样。我们现在会说：奴隶制多落后，多残酷！但是它正和槲槲一样，在当时很有进步性，至少捉住俘虏以后，不再都杀掉了。农民想好皇帝，想尧舜，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也不过是“槲槲”而已。包拯那样的“清官”，诸葛亮那样的“军师”，都可算是“槲槲”而已。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槲

棒在生产工具发展上的进步意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要在今天来提倡：“我们用桔棒！”“我们要好皇帝！”谁要是这样主张，我们准会骂他是顽固派，保皇党！把这个道理应用到思想史上：承认孔子有一定的进步性，并不是要提倡尊孔读经。我们必须划清时代界限。

最好还是看毛主席。他讲“先进的中国人”，开出一系列名单：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试想，康有为搞“保皇党”，搞“复辟”，搞孔教，顽固成什么样子？怎么也成了“先进的中国人”？这会使你大吃一惊吧！如果拿我们现在的尺度来衡量，岂止康有为，甚至连孙中山也还有他的落后面，洪秀全更不用说，捧袁世凯当皇帝的严复自然越发不在话下。那末这个名单岂不大成问题么？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些人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在一定限度内，都曾起过进步作用，他们的确都是那一个时期的先进人物，尽管他们后来有些简直开起倒车了。还不止这几个人，毛主席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的时候，讲了一段话，先说：三年以来为解放战争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接着说：三十年来为人民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最后更说到：近一百年以来所有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段话真是讲的好！不仅总结了三年以来的解放战争，近三十年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也总结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里面包括了多么复杂的各方面的人物，可是都被列在“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以内。毛主席已经把“永垂不朽”的人物上推到一百年，我们如果再往上推，来一个“三千年以来——甚至五千年以来——所有一切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对人民有贡献，为祖国奋斗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好不好呢？其实毛主席也已经教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了。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一方面要严格划清时代界限，对于历史上无论怎样了不起的人物，都要认识他们的局限性，决不作过高的估计，随便把他们和现代人物相提并论；但同时，另一方面，必须根据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分析批判，各如其分，只要在这个连绵不断的历史大流中任何一小段上有任何一点一滴的贡献，就必须把它肯定起来，承认它一定的进步性，决不让它埋没。

（3）阶级立场与历史主义

作历史评价，首先要明确阶级立场。这个问题好象很简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广泛一点说，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具体到历史教学上，我们对每一历史人物和事件，都站在当时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去讲话，这不就对了么？可是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讲历史，究竟是不管任何历史时期，都始终一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还是当奴隶制时期就站在奴隶立场上，当封建制时期就站在农民立场上，不断变化呢？离开无产阶级立场是不对的。可是如果我们讲到各个时代都用现代无产阶级的尺度量一量，说过去的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岂不违反历史主义？我想立场只能是一个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历史主义本身就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别的阶级不会有历史主义。封建主有历史主义么？农民有历史主义么？没有的。资产阶级象胡适之流，虽然好象也标榜